

韩信是汉朝开国的第一元勋。司马迁认为汉朝开国三分之二的功劳应该算在韩信头上。在整个楚汉之争期间，韩信首建大策，独当一面，明出子午暗度陈仓定三秦、声东击西虏魏王豹、强势突袭灭代相夏说、以3万士兵背水一战大破赵国陈余20万、以兵威胁迫燕王臧荼束手归降、突袭田广安定齐国，然后借淮水南摧龙且楚兵20万，直至四面楚歌垓下决战全歼楚军，无一败绩。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

韩信短暂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耳熟能详的成语和经典名句，如“胯下之辱”“一饭千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背水一战”“四面楚歌”“多多益善”等，这些成语名句恰恰体现了韩信一生戏剧性的张力。可是，韩信虽然功勋卓著，但是其下场在汉初三杰中却是最惨的。这么一个功勋卓著的国土，却招致刘邦深深的忌惮，并且最终为吕后所杀。一代军事奇才为什么会以悲剧结局？韩信究竟哪些行为导致了其悲剧结局？总体来看，韩信有四件事情干得很不妥。

一失邀功杀郦

《资治通鉴》记载，汉高帝三年，韩信领兵准备攻打齐国的时候，尚未从平原渡口渡过黄河，就听说酈食其已经劝说得齐国归降了，便想停止前进。辩士蒯彻劝韩信乘胜追击，邀功请赏。韩信觉得蒯彻的话言之有理，当即率军渡过黄河突袭齐国的历下军。结果齐王田广和相国田横恼羞成怒，把酈食其烹杀了。韩信的行动直接导致了酈食其的惨死。酈食其原来只是陈留一个家贫落魄的看门人，乡里人都称他为狂生，号称“高阳酒徒”，60多岁才毛遂自荐加入刘邦阵营，多次为刘邦出谋划策、出使诸侯，是刘邦很倚重的说客，很有功劳。后世学者甚至说假如酈食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刘邦就不仅有三杰了，汉初三杰将增为四杰。王夫之认为，韩信起了贪功之心，接受了蒯彻的建议，快速突击击溃已经投降的齐军，是导致酈食其惨死的罪魁祸首。韩信此举也导致了齐军喋血盈野，齐国田氏宗室被灭，不可谓不



□ 丁万明

韩信之失

惨。究其根本，都是因为韩信动了贪功之念。王夫之指出，贪功只是一念之间的事，但是导致的结果却是血流成河。王夫之毫不客气地痛斥说：那些因为贪功而残害别人的人，实际上也就是跟自己为仇，并且伸长脖子等着马上挨刀。可悲啊！这就是愚蠢透顶不可救药了。

二失请封齐王

刘邦与项羽在广武对峙期间，韩信斩杀龙且。平定了齐国之后，韩信派人向汉王上书说：齐国伪诈多变，是个反复无常的国家，且它又南临楚国。请允许我暂时代理齐王镇抚齐国。刘邦打开书信一看，即大发雷霆，骂道：我被困在这里，朝思暮想地盼你来协助我，你却想要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连忙暗踩刘邦的脚，接着就凑到他的耳边低声说：汉军目前正处在不利的形势中，难道还能禁止韩信自立为王吗？还不如趁势立他为齐王，好好地对待他，让他自行镇守齐国。不然的话，就可能发生兵变。刘邦这时也醒悟过来，乘机又改口骂道：大丈夫平定了诸侯国，就是真正的诸侯王，何必必要当个代理国王呢！这就是刘邦的过人之处，能够随机应变。反过来看韩信，讨封很不明智。当年，韩信在汉中时就对刘邦说过：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

后世很多人都指出这一点，如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点明：韩信自请立为假齐王，已种下被杀的祸根。按说，渴望进取不是什么坏事。但过于执着于功名就不太好了。王夫之指出，韩信的云梦之俘，未央之斩，祸患在他请封齐王之日就已经埋下，而欲念却在当年登坛拜将之数语。很多兵戎相见的悲剧都萌生于欲念妄动之时，这几乎是屡试不爽的教训。为人主者可有是心，而臣子且不可有是语。更何况即便是人主也不能一味靠封官许愿笼络人心。

三失消极观战

鸿沟盟约之后，刘邦撕毁盟约，与彭越、韩信约定一起乘胜追击攻打项羽。刘邦率部尾随追击项羽，彭越和韩信都没有按照约定前来，结果刘邦又被项羽打败。韩信、彭越尾大不掉不听指挥，刘邦请教张良该怎么办？张良告诉刘邦，这两个人不见兔子不撒鹰，你只要把分封给他们的具体地方都说明白，他们立马就会领兵前来。刘邦马上按照张良的意思分封彭越和韩信，专门按照韩信的意图把楚地分封给他，结果这俩人立马出工出力，项羽就此走上绝路。对于韩信大敌当前消极观战、邀功要赏之事，司马光就指出，这个时候刘邦实际上已经有了杀韩信之心，只不过是力不

能及罢了。

四失言行不检

刘邦称帝之后，韩信被剥夺兵权，回到楚国就任楚王。然而他却不懂得韬光养晦，言行不检点，授人口实。《资治通鉴》中记载了两件韩信在楚国所做的事。一件就是底护钟离昧；另一件就是排场。《资治通鉴》记载了这样一句话：“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这件事是说韩信在他的封国，巡视所辖县邑，出入都要调动军队作为自己的护卫仪仗队。我们知道，诸侯国的军队归中央直接管辖，诸侯国的国君是无权调动军队的，韩信犯了大忌。被人举报谋反之

后，刘邦采纳陈平的建议，以巡游的方式擒获韩信。谋反查无实据，但刘邦以此为借口，剥夺了他的王位，改封为淮阴侯，并把他软禁在长安，不许去封地。然而，这个时候的韩信仍然没有汲取教训。《资治通鉴》记载说：“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多称病，不朝从；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韩信只知道刘邦害怕并厌恶他的才能，于是就多次声称有病，不参加朝见和随侍出行。平日在家总是快快乐，并且耻于和曾经的部下绛侯周勃、将军灌要这样的人处于同等地位。我们知道，在此期间，刘邦亲征匈奴，身处险境，在白登被围七天七

夜。如果有韩信在身边，刘邦可能不至于那么狼狈。然而韩信误了事却仍然在闹情绪。甚至，刘邦问他：像我这个样能率领多少兵呀？韩信说：陛下不过能带10万兵。刘邦说：你呢？韩信道：臣多多而益善耳。刘邦笑着说：越多越好，为什么却被我捉住了呀？韩信说：陛下虽不能带兵却善于驾驭将领，这就是我所以被陛下逮住的原因了。何况陛下的才能，是人们所说的“此为上天赐予的，而不是人力能够取得的”。这番对话固然显示了韩信的自信，但身处如此境地还如此回答，让刘邦很是无语。

韩信如此执迷不悟，很快就大祸临头了。而这一切，与他的一位老部下陈豨有关。陈豨是韩信的老部下，被任命统领赵国和代国的军队之后，他前去见面韩信辞行。韩信握着他的手，屏退左右随从，与他在庭院中散步，忽然仰天叹息道：能和你说了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吗？陈豨说：将军您就下指示吧，我都听从。韩信说：你所处的地位，集中了天下精兵；而你，又是陛下宠幸的大臣。如果有人说你反叛，陛下肯定不信；然而再有人说，陛下就会起疑心；等到第三次有人说，陛下必定会愤怒地亲自率军来攻打你。若将来有一天你被逼谋反，请让我为你做个内应，那么天下就可以谋取了。

陈豨叛乱之后，韩信假称有病，

没有随从刘邦出兵。结果韩信手下舍人的弟弟上书举报韩信打算谋反。吕后得到消息之后便与相国萧何商议，假称陈豨叛乱已经平定，按照规定，太子要召见列侯及群臣朝中举行贺礼。萧何又欺骗韩信说：你虽然病了，也应当强挺着来道贺。韩信来到朝廷，吕后便派武士将他捆绑起来，在长乐宫钟室里斩首了。韩信在斩首之前，叹息说：我真后悔没用蒯彻的计策，竟上了小孩子、妇人的当，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吕后随后下令将韩信三族都连坐杀死。

韩信就这么死了。后人说韩信一生的成败得失源于“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漂母给他饭吃，吕后要了他的命。萧何月下追韩信，登坛拜将，也是萧何把他骗进未央宫殒命，这就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韩信死后，刘邦的态度是什么？刘邦听说韩信的死讯之后，“且喜且怜之”。高兴的原因在于，韩信的存在对刘邦而言始终是一个威胁，刘邦时时有如芒在背的被迫迫感觉，现在终于不用担心了；可可怜的是，韩信功劳确实太大，是难得的军事奇才。

司马迁对韩信之死充满了同情，为他写传不用其名，而名之曰《淮阴侯列传》，我们知道，司马迁给给陵君做传的时候也不像对待战国其他三公子那样直书其名，而名之曰《魏公子列传》，在司马迁看来，这两个人都是“无双国土”。司马迁认为，假如韩信能够学习道家的谦让之道，不居功自傲，不自以为是，那么没准还能善始善终。那样一来，以他对汉王朝的功勋，将来他的历史地位可以和西周时期的开国元勋周公、召公和姜太公相提并论，后世永享祭祀。司马光则在《资治通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抓住机会谋取利益，那只是市井小人的志向；建功立业报答知遇之恩，是讲究操守的士人君子的胸怀。



终军自荐当特使

□ 崔庆



公元前114年（汉武帝元鼎三年），对汉朝极为敌视的匈奴伊稚斜单于去世了。此前，卫青、霍去病统帅的汉军在多次战役沉重打击了匈奴主力，导致其远遁，“漠南无王庭”。新旧交替之际，是改善双方关系的最佳时机，汉朝着手物色出使匈奴的特使。

此时，汉武帝收到了一封言辞恳切、壮怀激烈的自荐信，写信者是武帝身边近臣——“谒者给事中”终军，这封自荐信有“三奇”。一是舍贵求险。终军少有才学，18岁时被选为“博士子弟”，后又被武帝赏识，成为近侍。这个岗位陪王伴驾，很容易脱颖而出，大有发展前途，一般人求之不得。此前不久，曾经西行万里的张骞刚刚过世，出使外邦不仅鞍马劳顿，而且祸福难料，更何况汉朝与匈奴连年激战，执行“破冰”任务风险极大。二是自揭其短。自荐信书生意气昂扬，深藏拳拳之心。终军向往为国披坚执锐、不避矢石，他完全没有强调自己的优点，反倒是坦言自己的不足，“年少材下，孤于外官，不足以充一方之任”，认为自己少经历练，希望通过艰苦考验增长实际能力，成为真正的干练之才。三是甘做绿叶。终军明确表示甘效辅助之力，“愿尽精厉气，奉佐明使，画吉凶于单于之前”。终军曾经以“天下为一，万里同风”为由，让假托皇命在胶东熬盐炼铁的徐偃认罪伏法、心服口服，既展示了说理明辨的本领，还坚定维护了中央权威和法律权威。终军有强烈的合作意识，知己所长，但不恃所长，希望找准切入点，为匈奴单于全面分析利害形势，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为达到国家的战略意图尽一己之力。

如此“求官”，无疑“自讨苦吃”，汉武帝以之为奇，并被深深打动，提拔终军为谏议大

夫。但是，终军没能去北方鹰击长空，而是振作南下，到一个更加棘手的地方——南越国。公元前113年，南越王赵婴齐去世了，虽然亲汉的太子赵兴继承大位，但是南越国内局势依然云谲波诡，和汉朝若即若离。丞相吕嘉是三朝老臣，一向支持赵兴的同父异母兄长赵建德，吕嘉、赵建德是本土势力的代表，他们虽然一时蛰伏，但仍不断串联勾结、暗流汹涌。

汉朝希望通过和亲加强与南越国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敦促南越王前来朝觐，使其真正成为汉朝控制下的诸侯国，这是一个精心设计，但也是一个凶险任务。终军再次请命，壮怀激荡、抒发胸臆，“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请缨”典故即出自于此。这次，终军如愿以偿，成为汉朝使团的副使，抵达南越后发挥了巨大作用，顺利说服南越王以及辅政的太后同意“举国内属”，成功完成了本职工作。但是，汉朝正使安国少季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错失良机，此后庙堂失算，低估了南越国内反叛汉朝的势力，后续支援不力，局势一误再误。南越丞相吕嘉铤而走险，策动本土派发动叛乱，杀害了亲汉的赵兴和太后，拥立赵建德为南越王。混乱之中，汉朝使团全军覆没，终军同时遇害，血洒边疆，令人扼腕。

当年，终军以才学入选“博士子弟”，从家乡济南步行前往长安，进入函谷关的时候，不取守关官吏给予返程凭证，感慨“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豪言在耳，一语成谶。



古人修身六境界

□ 岳文典

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积累了丰富的修身身心的理念和方法，它们被认为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点。王安石说：“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认为只有为政者情操高尚，品行端正，才能不负重托，治理好家国天下。

无我。在漫长的文化发展中，传统修身之道有着丰富的“公义”思想和实践。《尚书·周官》讲：“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意思是说，用公心消灭私欲，人民就会信任归向于他。《管子·心术下》也讲：“（气者）充不美，则心不得；行不正，则民不服。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这是引导人们要内心充满正气，行为端正无私，像天地一样没有私人偏颇，才能廓然大公，“公则天下平矣”。王阳明指出：“非至公无以绝天下之私，非至正无以息天下之邪，非至善无以化天下之恶”，只有公正无私，才能兼善于天下，最终成就“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

廉洁。廉洁就是不苟得，不妄取，不受不义之财，它要求为官者秉公执法，正直无私，不因财贿而出卖良心和原则。《吕氏春秋·忠廉》讲：“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即面对重大利益而不为所动，不改正直本色，这可称之为“廉洁”。古人之所以倡导为官者清正廉洁，因为“当官之法，惟有三者：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也就是说，唯有清廉、谨慎、勤政，才可以保持官职，避免身败名裂的下场。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包拯，为劝诫子孙后代清正廉洁，在其《家训》中写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莹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正气。修身之道，首先是修正自

己的言行举止及习性，这就是所谓“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就是说，如果行为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要反过来检查自己的视听言动，以便修正、改进，为之后成事奠定基础，只有自己行为端正，才能“其身正，不令而行”。而反求诸己的方式在于“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这就是要有自省、反思和自我超越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见贤思齐，不断提高自身境界和素养。在自我提升的基础上，古人也讲求“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也”，“君子义以为质”，意思是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特别赞成的，也没有特别反对的，一切以是否合乎正义、道义为判断标准。

躬行。传统修身之道还尤为重视切实躬行，践履不辍，不尚空谈，这一文化传统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周易·蒙卦》讲：“君子以果行育德。”就是说，君子以果决的行动培育自己的德行。“行不力，则虽‘精义入神’，亦徒为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于我哉？”如果不能做到，对道德精义领会得再深刻，也只是空洞的言论，于己无益。因此，石成金在《传家宝》中讲：“说得千般明晓，不如行得一事到底。”对于为政一方的官员，更要以实干为准，“君子当官任职，不计难易，而志在必为，故动而成功”。真正做事、实干，无须巧言令色，只需笃定而行，终将花开见佛，“欲人之信己也，则微言而笃行之。……行久而名誉远”。

民本。古代士人君子修身从政，均以施行仁政为目标。所谓仁政，就是要养民、惠民、安民、教民，使民众衣食无忧，安居乐业，并能受到教化。《尚书·大禹谟》讲：“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即政德的表现在于推行善政，而善政在于养护民众，因此，真正的政德就是以民为本。而以民为本，首先就要维护民众的利益，

富民惠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二程也指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在养民、惠民的基础上，还要安民、教民，只有让民众普遍受到教化，整个国家和社会才能安定祥和，永续发展。“躬道德而敦慈爱，美教训而崇礼让，故能使民无争心而致刑错。”“致刑错”，就是通过道德礼仪的教化，使民众通达事理，礼让无争，无人触犯法律而使刑法搁置不用，这无疑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良好境界。

不渝。古人修身讲求志向坚定，毫不动摇，甚至置生死于度外。《论语·子罕》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就是强调志向坚定的重要性。《论语·卫灵公》又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就是说，有志于仁德的人，不会为了苟且偷生而损害仁德，宁可失去生命也要成就仁德。屈原在《离骚》中也讲：“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同时，中国文化以“道”为文化的最终依归，并形成了一以贯之的“道统”，为维护 and 弘扬这一道统，古往今来，历代士人君子无不殚精竭虑，坚忍不拔，一如既往地身体力行，践履不辍，“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中国文化绵延几千年，始终展现出对精神追求的持之以恒和矢志不渝。

